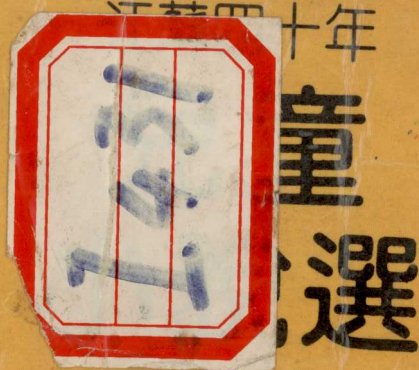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I-287.4
L237

816114

940114



20135989

1949—1989

江蘇四十年
兒童
小說選

郁炳隆 編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徐州師院圖書館

江苏四十年儿童小说选

郁炳隆 编选

出版：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版 11.37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46-0313-7

I·76 定价：4.75元

责任编辑：薛屹峰

940114

回顾与断想

(代序)

郁炳隆 顾柏承

别林斯基说过,“文学有巨大的意义:它是社会的家庭教师。”^①我们不能低估这个要言不繁的论断。重大的史实往往伴着后人对它的评价一起载入未来的史册。一个时代对于前一个时代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它就有可能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迈出多大的步伐。在收编《1949—1989·江苏儿童小说选》的时刻,对历史作些回顾,总结一下四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迅速而深刻地认识过去,从而更有力地迈向明天,应该是有益而必要的。

儿童是世界的初始,这是一个慢慢长大着的世界。它从一起步,从一到多,不断地鲜明丰满起来,向成人世界进发。与此同时,成人不管正确与否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文学,在儿童身上不断地投射自我,要将世界交给儿童——未来的主人。爱伦·凯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是儿童的时代。”既然重视儿童是人类成熟及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那么人们的“儿童观”必然不断地趋向于合理。于是,支配于一定儿童观的儿童文学反过来便成为观察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风标和窗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儿童文学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相关联,从此在这块土地上便有了自己的地位。

历史地考察1949年至1989年我国、我省儿童文学创作的历

程,我们会发现,这四十年中既有成绩,也有失误,而且发展中
有曲折,前进得很吃力。它大概是一个时期一种步态,几乎与
共和国的足迹重合着:

1949——1956: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儿童文学呈现出
健康向上的主旋律。

年轻的共和国的诞生,使大陆上爆发了持久不息的举国欢
腾的局面,党和政府把培育新一代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联系
在一起,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理所当然地受到关心,儿童文学
因之备受重视。然而,长期的战争造成了文化出版事业的萧条
和荒芜,新中国无法在一个早晨扭转儿童读物奇缺的局面,饥
不择食的孩子们面临黄色书刊侵袭的危险,儿童文学只有割除
腐肉才能获得新生。为了鼓励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
作品,1954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具有
重大意义的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和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
尔后,中国作家协会给一百多位作家规定了创作任务。于是,老
作家和文学新手们都勤奋创作,一些少年儿童报刊和出版机构
也应运而生,儿童文学事业初步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建国
初儿童文学的恢复,绝不是解放前机械的还原,而是孕育了一个
全新的雏形,它也许稚拙,却单纯而明朗,并在循序渐进中
显示着勃勃生机,呈现出健康向上的格调。当时的江苏,较之
北京、上海两个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虽然暂时还显得薄弱,
但从全国的范围看,还是起步比较早的,已初步有了一支创作
队伍,省人民出版社也于《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不久,即专门
成立了少儿读物编辑室,在一九五五和五六两年共出版了各类
儿童文艺读物八十三种,这在当时来说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绩。

1957——1965: 走向曲折,在困顿艰难中摇摆起伏。

正当儿童文学初步呈现繁荣景象,1956年党中央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预示了文艺更加繁荣的前景时,人们持着期待和信心走进了1957年。可是,历史躲闪不及,反右斗争扩大化,整个国家被砸开了一个深深的伤口,而文艺事业首当其冲,最伤元气。1958年,又对“童心论”、“儿童文学特殊论”大加挞伐,指斥儿童文学领域“古人动物满天飞,可怜寂寞工农兵”,于是“成人化”倾向恶性蔓延,童话、寓言销声匿迹。幸好历史为儿童文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夹缝,1959年、1961年分别出现过思想活跃的局面,创作出版了不少好作品。我省张彦平、赵沛、黄天戈等老作家也推出了《宝井》、《白额牛》、《黑龙湖的秘密》、《“小没魂”放鸣》等优秀之作,为我省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回顾1957——1965年的儿童文学,我们发现,左的倾向驱使作家们在狭小、限定的领域里旋转,多数作品只是机械地为生活伴奏,语言中还夹杂着大量生硬的政治术语和通行的空话,结构上往往还因袭着陈旧一律的套子,是谓“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今天,当生活登上了更高的台阶时,我们不要过多地苛求那些作家,因为当时生活提供和允许他们的只有那么多。再说,历史只能总结,却无法对它选择。

1966——1976:严重的摧残,灾难性的破坏。

“十年动乱”,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和扭曲,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最深重的灾难。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作家们遭到残酷迫害,优秀作品被全盘否定。与此同时,他们又把文艺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于是在“三突出”、“主题先行”的黑旗下,炮制着一个个假孩子、角刺兼备的“好孩子”、头绕灵光圈的神孩子。儿童的天真无邪、儿童的

言语思维，都被同“走资派”的幻影进行斗争的红小兵的口号声所吞噬。这个时期中国的儿童文学成了世界上最坏的鸚鵡，它比锡德尼说过的“浪费时间、说谎的母亲、腐化的保姆”还坏。江苏也逃不了同全国一样的命运，尽管出版了《红小兵》等刊物，尽管创作队伍有所扩大，吸引了一大批业余作者为孩子写作，作品的数量有所增加，然而实际的水准却是倒退。因此，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一段历史时，目光所及，竟是一片荒芜和悲凉。当然，其中少数作者此后经过努力，在新时期中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1977——1989：解冻、复苏，走向繁荣。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然而，也许因为胜利的狂喜一时无法平静，也许因为劫后余生而心有余悸、预悸，面对孩子们严重的书荒，溃不成军并且与读者群不成比例的作家们，虽然松了绑却因手脚还僵硬而无能为力。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前两年是过渡期，它让人们在历史的变迁中得以清醒与再生，坚冰开始消溶。1978年，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尔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作激情，使他们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冲开一切桎梏和羁绊，获得了喷发性的飞跃。由于摒弃了急功近利的狭隘的文学观念，这时的儿童文学再也不是跟在生活的锣鼓后面鸣唱的陪衬，再也不是政治事件的简单的附庸了；而是作为一种独立地思考生活，强调审美功能的特殊艺术形式而重现在文坛之上。其主题的凝重、题材的多样、以及在形式上进行探索、更新的步伐，也为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这个阶段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在全国儿童文学的大潮中，江苏是一个奔涌的潮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新时期诞生了，原有的《少年文艺》改为月刊，

大型儿童文学刊物《未来》创刊，至此，我省儿童出版事业具备了空前规模。随着少儿出版事业的发展，我省的儿童小说作家队伍也空前壮大起来。一批有才华的老作家如张彦平、海笑、赵沛、黄天戈、戴石明等，老当益壮，勃发了旺盛的创作力。同时，一批经受了“文革”苦难，在新时期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如程玮、刘健屏、黄蓓佳、程远、方国荣等，在老一辈作家的培育奖掖下，不断突破左的束缚，向传统的儿童文学禁区开拓前进。到了八十年代，少儿作家队伍进一步壮大，来自中小学教育岗位的有茅庆如、丁阿虎、范锡林、龚慧瑛、张明观、杨清生、须一心等，来自高等学校和文化机关的有曹文轩、刘元蓉、许永、黄宏、金曾豪、颜煦之、吴霄等，呈现出人才济济、佳作累累的空前繁荣景象。他们敏锐观察、深沉思考，又勇于探索，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开了新局面。他们的作品不断在全国获奖，不断受到儿童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正如评论界所指出的那样，江苏的儿童小说创作异军突起，堪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源地的上海、实力雄厚的北京相媲美，对全国儿童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共和国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四十年历程，江苏儿童小说创作也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这足以说明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我们在繁茂的小说林中浏览巡礼，按历史形成的年轮，对各种林木摘枝采叶，选编成《1949——1989·江苏儿童小说选》，目的是作一次检阅，向建国四十周年庆典献礼。

新中国在推翻三座大山的炮火中诞生，革命战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乐章。当作家们为少年儿童奉献精神食粮时，革命战争便成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常表现的题材。收编在集子中的《小妮儿》、《宝井》、《小兵的脚步》三部中篇小说，正好勾勒出了这类题材发生发展的轮廓，从一个侧面揭示

了四十年来江苏儿童小说创作不断演变、深化的轨迹。

戴石明写于五十年代初期的《小妮儿》，叙述一个儿童团员协助“老百姓的队伍”打击敌人的故事。小说注重于对生活的忠实记录和迅速反映，逼真地再现了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历史风貌。作品的人物和情节都不复杂，典型地体现了五十年代初儿童小说创作的一般特征，即缺乏艺术上的锤炼工夫和对历史的深入反思，但有着质朴、清浅的格调及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浓厚的时代气息。

同《小妮儿》相比，五十年代末期张彦平的创作不再急切地去记录昨天的历史，时间上的距离使作家有可能抛开过于功利的政治目的而开始对人物、情节、语言诸方面进行艺术的探索 and 追求。《宝井》中的主人公小金是个没有褪尽孩子气的活泼少年，他总想干大事，总想关心和介入大人的事情，然而大人们又总把他看作“小毛娃”。作者抓住这个充满情趣的矛盾，通过探索“宝井”和抗日除奸两条并行的结构线索，铺开情节，刻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宝井》较之《小妮儿》是一次完善，是革命战争题材在那个年代的开拓和深入。

到了八十年代，革命战争题材有了新的写法。海笑在《小兵的脚步》中打破了传统的艺术格局，他尝试着运用“东方意识流”的叙事方式结构故事。小说借用石小岗自述的第一人称来叙述，具体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毛毛草草的“小鬼”成长为新四军小战士的心灵历程。细腻生动的心理刻画，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亲切自然的语言，显示了新时期的创作特色。

《小妮儿》等三部作品是前后关联、不断发展的，都分属于诞生它们的时代，刻有老作家常有的传统文艺观、战争观的印记。如今，如果仅仅满足于塑造几个机智勇敢的少年形象，满足于讲述一个惊险紧张的战斗故事，或者仅仅着眼于叙事模式或结

构手法上的变化，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小读者的阅读需求了。艺术的创新需要向传统借鉴，却不能原封不动地重复和照搬。

人需要理解、友谊、信任和爱，孩子尤其如此。但是，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情感，在“十年动乱”中受到了最粗暴的践踏和凌辱。当历史翻过这辛酸的一页，黄蓓佳、黄宏、程远等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作家们，便很快在充满渴望和幻想的童蒙世界里注进了这种已经久违的人性和人情。

黄蓓佳的《忠诚》，写的是一个带着“伤痕”色彩的“猫”的故事，但作家的立意却在人间。小说用“虎子”（猫）对主人的忠诚、对老猫的孝顺，来反衬“文革”中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漠。“虎子”忠于职守、善解人意，曾给主人带来了人生的暖意、生活的信念。但就是这样一只惹人喜爱、与世无争的小猫，最终还是逃不过被碎尸剥皮的悲剧！“虎子”的命运是令人悲叹的，而由之引起的“回味、思索”却已超出了关于猫的命运本身，作家笔锋所指，实则是在人间：“人总是贪恋生命，关键时刻可以抛弃一切：家、财物、事业、甚至亲人。比起某些低能的动物来，人难道不应该觉得脸红吗？”

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人更加怀恋美好真挚的友情。黄宏的《长辫子老师》用轻灵的文笔抒写了一曲师生友谊的赞歌。故事发生在抗日时期某乡的一所破庙里。小说通过“小黑皮”与新来的女教师之间的几次纠葛，展开了“小黑皮”退学、新老师做鞋、立夏节送蛋等情节，一步步将师生间的感情推向高潮。最后老师要调走，她怕自己和同学们不堪忍受别时的悲哀，只好留下一纸温语悄悄地走了。前来送行的同学们，不见了老师，于是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声深情的呼唤。小说以此向人们证明，“四人帮”可以发出“臭老九”、“小绵羊”的辱骂，可是却不能长久离间和夺走师生间珍藏于心中的真挚友谊。

纵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理解、友谊、信任和爱仍然闪耀着摄人心魄的光辉。曹文轩的《再见了，我的小小星星》写出了“文革”期间下乡知青雅姐和村童星星之间的友情。雅姐出身于书画之家，“星星”则是个桀骜不驯的浑身透着一股野性的乡下孩子。雅姐喜欢画画，她“爱太阳和月亮，爱土地和河流，爱轻风和雨滴，爱那春天似流动着的绿色。她是那样温柔、那样恬静、那样优雅、那样含情脉脉，微微的忧戚里含着高贵的神情。”作者在这里简直把雅姐描绘成了“爱”之神。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如果孩子得到了爱和尊敬，那么他的行为中破坏性、侵略性成分就较少。^②小说中倔强的星星在雅姐那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爱之光的照拂下，终于变成了一个善良、正直、坚毅同时又热爱艺术的少年。

程远的《弯弯的小河》写得很抒情、深沉、优美。那段由于极左路线而硬是扯断了的少年“我”跟少女张秀萍之间的纯洁友谊，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淡漠，反而更加清晰起来，成了对极左路线罪恶的控诉。但是同曹文轩一样，程远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控诉上，而是努力在孩子们的心里重建被极左路线破坏掉了的生活信念。小说结尾处写道：“我时常站在弯弯的小河旁，看清清的流水，浮想联翩。我想，现在，她在党的温暖的阳光下，一定生活得很幸福、很快乐。”这些句子也表达了作家本人对生活、对未来、对儿童乃至人类的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在我们当前这个世界里，只有对人类持有信心的人才能对少年儿童有所帮助。”^③即使在写“伤痕”时，也不忘给人间涂些亮色，这正是年轻作家们对生活，对未来持有积极态度的表现。

到了八十年代，我省的儿童小说开始从单一的“文革”题材中走出来，写出了新时期理解、友谊、信任和爱的一曲曲赞歌。龚慧瑛的《我愿，也有一本这样的纪念册》用“我”大姨纪念册上

的三句“留言”，巧妙地结构全篇，多角度地展开了“大姨”的高尚灵魂和广博的爱心。张明观的《“先生公公”和白字老师》在故事情节上跟《长辫子老师》相近，但小说的色彩明朗而非沉郁，小说的格调也更加轻松。方国荣的《彩色的梦》以绵绵的情丝、瑰丽的想象刻画了两颗美丽的童心。天真的欣哥的色彩斑斓的梦幻，失明的晓虹对七彩生活的憧憬，所有这些充满诗意的艺术描写都将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是总的来说，以新时期为时代背景的这三篇抒写人性人情的儿童小说，似乎尚没有《忠诚》等作品来得深沉和富有力度。是缺乏对生活的更深入的思考，还是缺乏一定的时空距离和情感积淀，抑或是缺乏对变化发展着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准确把握？所有这些问题是很值得儿童文学界进行深入探讨的。

爱是疗救人们心灵创伤，促进灵魂健康发展的良药。但是，人类的历史却不全是由爱的力量推动的。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为了挣脱灵魂上肉体上的枷锁，为了消除社会上的不平和罪恶，为了获得生活的美满和幸福，人们不得不同一切丑陋和非人道的东西进行斗争。告诉儿童友谊和爱的价值固然重要，但告诉儿童社会上还有不平和罪恶也同样重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小说应该激发起少年儿童同邪恶抗争的勇气。本集子收编的《白额牛》、《黑珍珠》、《独狼》三篇小说，正体现了上述宗旨。

黄天戈的《白额牛》创作于六十年代初。“白额牛”象征着厄运，而穷苦的“我”家只有收留“白额牛”才能摆脱“剥皮鬼”李二板的压榨欺凌，命运就这样捉弄着穷人，但黑心的地主老财却要断绝穷人这唯一的可怜希望。小说通过内在节奏的张弛和人物感情的起伏，细致逼真地写出了“爸爸”对“白额牛”由无奈收留到无畏使用、面对李二板的欺压由逆来顺受到逼上梁山的心

理发展过程，形象地表达了作家对旧时代中以黑心的李二板为代表的恶势力的憎恶和对“爸爸”抗争精神的肯定。

赵沛的《黑珍珠》发表于八十年代，作家以幽怨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久已消逝的遗梦”。游方郎中陈二先生因斗鸟输掉了女儿，他想借善斗的“黑珍珠”再去把她赢回来，可偏偏“黑珍珠”被道貌岸然的搨主偷走，陈二先生因此发疯。优美的江南小镇景色的勾勒，精彩的春季斗鸟比赛的场面描写，更强烈地反衬出陈二先生遭遇的悲剧性。这里，作家那简洁老练的文笔，那对纷芸繁复的人生世态的洞察，以及在对陈二先生及搨主的描绘中所表现出的良知，都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金曾豪的《独狼》，描写一只“健壮、聪明、蛮横、凶狠”的雄狼，因为冒犯头狼而被逐出了狼群，从此开始在狼群、老虎、鹰隼、人类的夹缝中厮杀求生。作家在开头语中写道：“……在大自然中，它们或许算不得强者，然而，它们确是拼死拼活地争取着当强者的。”“那些歌颂弱者的、把大灰狼作为反角的优美童话已经过时了。”小说表露了作家对独狼的强烈的求生意志和坚定的斗争精神的肯定和赞颂。独狼是残忍的，但在险恶的环境里，唯有战斗方能生存，这正是大自然中铁的定律。

从《白额牛》到《独狼》，我省的儿童小说作家对生存竞争的理解已逐渐抛开了狭隘的、政治的偏见和曲解，而开始变得更加超脱和通达。他们极力希望少年儿童能早日全面地认识我们的社会，极力想在我们传统的以“仁”爱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中加进竞争的因子，这是“强国梦”的民族心理在当代文化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为古老的华夏文明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挑战，苍茫的黄土地上正奔涌激荡着一股浮躁不安的潜流。今日的少年置身于中外文化文明的碰撞、融合、渗透、吸收的伟大的转折

期，全新的、复杂的生活环境悄悄地熔铸着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理和思想性格特征。因此，对于如何准确地把握和真实地表现“竞争时代的少年”形象，敏感的儿童文学作家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综观我省此类儿童小说创作，我们认为基本可分三种情况：

一是要求儿童文学担当起“塑造民族个性的天职”。曹文轩认为：“当年鲁迅先生用一枝锋利如刀的笔，直中民族中自大、空疏、依赖、因循等种种弱点和要害，并在强烈的憎恶中一贯有深刻的悲悯浸润流注。这种精神，未必过时。”他同时认为：重塑民族性格的“儿童小说不再简单地赞美忍让、老实、厚道和温柔之性格，而把许多优美的篇幅给了阳刚之气。文学有了力度和强度，不再那么苍白、软弱和轻飘。”^④强调“阳刚之气”，强调“力度和强度”，这显然是近百年来渴望国家强大民族昌盛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重塑民族性格派的代表作家有刘健屏、范锡林等。

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可以视作重塑民族性格派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熊荣是某县委副书记的儿子，他性格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蔑视权威（老师的、父母的）、憎恨虚伪。从有意刁难老师的提问，到搜查刘耀的作弊证据；从恶作剧式的放掉老师车胎里的气到要求做法官的远大理想，熊荣都显示了他那独立思考、敢说敢做的可贵性格。

杨清生的《字纸篓·邮筒》揭示了一个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的主题。长期的封建文化的钳制，使许多中国的少年儿童完全丧失了自我，他们总是习惯于听从父母的意志、长官的意志、权威的意志。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字纸篓·邮筒》中的主人公小黎，面对母亲的高压、庄老师的威严，愤怒地喊出了要求自主的心声。新时期的儿童终于开始走出儒道文化

的怪圈，健全的个性开始在孩子们的心灵里破土发芽。

须一心的《落叶琵琶》开始为“君子”所远之的庖厨张目。让我们听一听蔡小普的宣言吧：“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的同学爱唱歌跳舞，有的同学爱飞机模型。我呢，爱学做菜……”如果说熊荣和小黎在反叛传统时还不时地感受到传统的压力的话，那么蔡小普的反抗传统习见、确立自我个性却已显得十分地自信、坚定而不带任何胆怯和羞涩。只要我们把《落叶琵琶》中的蔡小普同马春阳写于六十年代的《“小没魂”放鸭》中的“小没魂”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落叶琵琶》崭新的时代意义。《“小没魂”放鸭》中的“小没魂”虽然顽皮，却是个听话的孩子。他钻研放鸭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责任”，而非个性自我的觉醒。蔡小普则相反，他决不因同学们的议论而放弃自己的爱好，他学做菜并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压迫，他也不认为做菜有什么低人一等之处。充满自信、张扬自我，这正是重塑民族性格派特点的核心。

重塑民族性格派的出现，为我省乃至全国儿童文学界带来了一股春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塑”派小说创作的“观念化”倾向日趋明显。也许它将成为“重塑”派创作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二是要求儿童文学成为沟通人们“心灵之间的桥梁”。程玮在《从〈白色的塔〉说开去》一文中写道：“世界是这样的广阔，作为个体的人相形之下是这样渺小。在一定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显得很困难。所以有了文学。文学是心灵间的桥梁。”“儿童文学除沟通孩子与孩子的心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沟通孩子与大人，以至孩子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⑤传统的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总是那么的清浅、天真、不带一丝的忧虑。新时期的作家发现生活中的儿童并非如此，儿童自有儿

儿童的孤独、烦恼，有时候他们也会皱起双眉观察世界、思索人生，他们的内心深处渴望着被理解、被尊重。沟通心灵派的作家把儿童的孤独、烦恼收之笔端，热切地呼吁着社会对儿童的理解和尊重。

茅庆如《啊，十四岁》中的女主角林芝，是个孤僻又早熟的初中生，幼小的心灵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真诚相待，而严酷的现实又使她只能封闭自己心灵的窗户。她认为除了父母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在做着交易”。同桌“模特”蔡光带到学校玩的“圆珠笔”使她突然发现自己心中唯一的偶像也倒塌了。小说借助林芝的日记来展示其心理，借助蔡光赠送的“英雄金笔”来肯定现实生活中的“微笑”。应该说，小说结尾处林芝的转变缺乏足够的信服力，整个小说的构思还基本建立在古典的意义上。

同属古典层次的还有刘元蓉的《爸爸的脸色》。小说主人公“爸爸”是个“喜怒无常”的人，对家里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平等观念，家里人平日还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市二路公交车改道，“我”因张贴了一张改道线路图而受到《苏州报》的表扬，“爸爸”似乎在这时才发现自己儿子的存在。终于在二路公交车复线运行时，父子俩走到了一块。小说的结尾虽然透露出父子两代人相互理解的曙光，但实际上他们离真正的理解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刘健屏的《孤独的时候》已经脱尽了古典的痕迹，作家犀利的“雕刻刀”无情地伸向了人性的深处，毫无遮掩地向人们展示着人性的全部隐密。一个意外的事变把一向自视甚高的吴小舟打入了“傻乎乎”的姜生福们的行列。孤独的吴小舟因此而与同样孤独的姜生福结下了真诚的友谊。但是，随着吴小舟在学校在家庭的地位的改变，他慢慢地疏远了禀性善良、为人诚恳的姜

生福。作家在这里无意于简单地责备吴小舟“过河拆桥”行为的不道德，相反对吴姜两人友谊的破裂表现出一种虽惋惜却无奈的神情，并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吴霄的《留影》把目光转向了孩子与大人之间应有的平等信任问题。桐桐要求给妈妈拍一张照片，但没想到舅舅和妈妈合伙欺骗了他。小说结尾桐桐哭了，这是对欺骗孩子的大人们的一种抗议，更是为孩子得不到大人们的信任和理解而流露的哀伤。

颜煦之的《黑围裙》努力揭示出孩子与大人间的代沟。苏姗看不起软弱的妈妈，更看不起邋遢的爸爸。她认为美丽能干的妈妈不值得作出如此大的牺牲。她不愿再走母亲的道路，而要“我行我素”，毫无愧色地去全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在小说中，“黑围裙”象征着中国妇女传统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小说的结尾苏姗把“黑围裙”掷给了“爸爸”，暗示着苏姗同传统决裂的坚定决心。

从根本上说，沟通心灵派同重塑性格派是相通的，它们都在极力打破传统的儿童观，它们都在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即确立全新的儿童观。从颜煦之的《黑围裙》，我们看到了沟通派和重塑派相互融合的可能。

沟通心灵派作家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儿童世界：这里的色彩不再一味地明艳，这里的基调不再一味地欢快。敏感的作家们为我们剖析着一个个孤独的、渴望理解和友谊的、思索着的孩子的灵魂。但迄今为止，沟通心灵派作家们的创作已明显地显示出成人文学化的势态。“看不懂”三个普通又平常的字眼随时有可能将成人化的儿童文学逐出儿童的世界。这里，似乎用得着高尔基的一句话：“想写儿童文学的作家应该估计到读者年龄的一切特征。否则，他写的书会成为儿童和成年人都